

# 沿着季风的方向

作者：刘子超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印度

□

缅北

□

缅北

□

缅北

□

缅北

□

缅甸

□

缅甸

□

柬埔寨

印度

## 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

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。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。

——V.S.奈保尔

## “百年纪念号”特快：新德里—阿姆利则

印度人告诉我，如果了解真实的印度就要去印度的农村。我以为这并非完全准确——因为印度人已经把他们的农村搬到了火车站。

在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鸽子扑扇着翅膀飞进飞出，把羽毛和粪便毫不留情地撒在安之若素的旅客身上。门外是烈日与噪音。人力三轮车、“大使”出租车、摩的，像一个个愤怒的原子做着布朗运动，似乎又保持着一种奇怪的秩序。水牛悠闲地把脑袋伸进垃圾堆，寻找烂菜叶，旁边还有两只正在抓跳蚤的猴子。它们在印度都被视为圣物——湿婆的坐骑和毗湿奴的帮手。

来印度之前，我读过不少关于印度崛起的报道。它们像一种背景音乐，充满极具催眠效果的旋律。但在新德里火车站，我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迹象。一切似乎和1897年马克·吐温在《赤道环游记》中描述的场景一样：“在火车站，沉默的寄居者带着简陋的行李和家什，坐在那里等待——他们在等待什么呢？”

我在人体迷宫中左冲右突，像玩着童年时代的“跳房子”游戏。到处是打地铺的人，老老少少，把这里当成“爱的港湾”。他们似乎早已适应这样的生活：有的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，有的坐在地上安详梳头，有的在水龙头下愉快冲凉，有的生火做饭，有的目视远方，有的从编织袋里拎出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……很多人的表情中带着四川人所说的“安逸”。

对现代化的定义，印度人一定比我乐观。对于眼前的情景，他们充满熟视无睹的平静，在这座没有围墙的“村庄”来去自如，巨大的车站仿佛一部宝莱坞电影的豪华布景。

“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的退隐态度的一部分，”V.S.奈保尔写道，“这种心态，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，但印度人却把它转换成一套博大精深，强调消极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。”

我被裹挟在人流里，呼吸着混合垃圾、霉斑、人体和咖喱味的空气——那是人性的气息、印度的味道。

“感受异国情调的首要工具是嗅觉。”T.S.艾略特曾说。如果他没有去世，我真想告诉他，这话可靠得如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穿过形式主义、敷衍了事的安检，我看到长达一公里的“百年纪念号”列车。它横亘在1号月台下，每节车厢上都标示着等级。从普通座席(Non-AC)走到豪华空调舱(EC)，你走过的绝不仅是几百米的距离和相差五倍多的票价，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。空调舱的乘客大都是新兴中产阶级，他们富裕、有教养、说英语，是时代的受益者；普通座席的乘客则是印度的普罗大众，是那些经常在电视里出镜，坐在车顶上、吊在车厢外的老百姓。

印度的铁路已有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。1853年4月16日，孟买到塔纳三十一公里的铁路开通，宣告印度开启现代化进程，彼时的中国还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阵痛。

最初，英国殖民者们怀疑，在印度这个遍布苦行僧和乞丐的国度，是否有必要修建铁路。他们付得起车费？他们有提高生活节奏的必要？最重要的，他们会选择火车而不是牛车？种姓制度也是一大难题。人们会允许“不可接触者”与婆罗门并肩坐在一辆火车里吗？

1843年，后来成为印度总督的达尔豪西勋爵力主修建铁路，很多印度人至今引以为豪地记着他的一段话：“伟大的铁路系统必将彻底改变这个烈日下的国度，它的辉煌和价值将超越罗马的渡槽、埃及的金字塔、中国的长城，以及莫卧儿王朝的寺庙和宫殿。”

然而，我选择铁路作为印度旅行的工具，除了一睹“超越长城”的辉煌外，更因为它至今仍是印度最可靠的交通方式——尽管它惯于晚点，与中国的高铁相比也相形见绌，但比起破败的公路，它却可以较为舒适地把你送到印度任何一个角落。

另一方面，一列火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巴扎、一个微缩的社会、一家舒适的旅馆、一段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旅程。当“铁公鸡”一路鸣叫，绝尘而去，你既可以饱览沿途风光，也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乘客。

——比如辛格先生。

他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看人时眼珠几乎都躲到镜片上方。我一坐下来，他就告诉我，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——从印度的心脏到印巴边境——这趟城际特快只需要九个小时。

辛格先生是旁遮普人、锡克教徒。他穿着衬衫和西裤，蓄着大胡子，戴着红头巾。和我说话时，他打开万宝龙皮包，拿出黑莓手机，腕上是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。

锡克教徒是印度最容易辨识的族群。他们戴头巾、不剃发、穿特制短裤、戴钢质手镯、使用“辛格”(Singh)作为姓氏，意为“狮子”。这些标记让一个锡克男人永远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。

锡克人以勇猛善战著称，这与他们倡导以暴力抵抗迫害的宗教传统密不可分。然而，有些锡克人也非常温柔，比如我身边的辛格先生。火车一开，他就打起电话，语调温软，简直让人怀疑不是从他那强壮的、长满汗毛的身体里发出的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两则关于锡克人的笑话。一则说，一个锡克人准备移民加拿大，被告知要先和一只狗熊摔跤，再强奸一个印第安妇女，以此来证明自己能做一名真正的加拿大人。一个月后，这位头巾散乱、带着一脸伤痕回来的老兄宣布：“现在，我该去和印第安妇女摔跤了。”另一则笑话讲的是，一个锡克人错过了巴士，他一路狂追，最后竟然跑回了家。他得意地告诉妻子，他因此省下五十卢比的车费。他的妻子遗憾地说：“如果你追出租车回来，就能省下一百卢比。”

我们的火车正在穿越号称“印度粮仓”的旁遮普平原。窗外地势平坦，一碧万顷，村落皆隐于田畴之外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京广线上，穿越同样景色的华北平原。但与华北平原不同，在三面环海、北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印度次大陆，意为“五河汇流之地”的旁遮普是印度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陆路走廊。这一地理位置与其说是幸运，毋宁说决定了这里从古至今跌宕起伏的命运。

在印度历史上，每一次异族入侵，侵略者无不是通过旁遮普这一门户，进入印度次大陆。每次侵略都伴随着杀戮与征战，给眼前的土地留下深深的烙印。

公元前6世纪，波斯君主最先入主旁遮普地区。他们在这里的统治维持了近三百年，一直到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地。他们留下的古代钱币至今仍埋在旁遮普的土地里。

公元8世纪，勃兴的伊斯兰教开始扩张，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征服者。在穆斯林的统治下，旁遮普经历了一场经济、文化的蜕变。印度教的血液被强行注入伊斯兰教的基因。伊斯兰君主热心文学和艺术，大批工匠在财富的诱惑下来到旁遮普，各种工商行会也遍布这里的城镇与村庄。

16世纪20年代起，莫卧儿人——成吉思汗的后裔，掌控旁遮普长达两个多世纪。其间，旁遮普人反抗不断。一个名叫那纳克的簿记员之子，创立锡克教，被旁遮普人称为“照亮黑暗的第一缕曙光”。然而，莫卧儿军队与锡克人的冲突持续不断，以致战争成为常态。1675年，第十代古鲁戈宾德·辛格登位，他积极改革锡克教，将入教仪式由“足洗礼”改成“剑洗礼”。“剑”开始被锡克教奉为圣物，武士成为宗教的圣徒。按照教义，每一名武士都有两把剑，分别象征世俗和精神。当和平手段失败，武装抗争就成为锡克教徒的使命。他们承受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。从1708年至1764年，莫卧儿军队对锡克教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。据史料记载，每个锡克人的脑袋都被定下价格。十世古鲁的两个儿子也被莫卧儿人用砖块砌起来活活闷死。锡克人躲进深山，直到莫卧儿王朝亦风雨飘摇，他们才在兰吉特·辛格的带领下成立了锡克帝国。

这是旁遮普最后的辉煌，辉煌得如同兰吉特那颗为世人所覬覦的柯伊诺尔钻石（世界最大钻石之一，重一百九十一克拉）。兰吉特·辛格死后，不可一世的不列颠人来到这片土地。

两次英锡战争后，兰吉特·辛格的儿子被带到英国，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那颗钻石。维多利亚女王赐给兰吉特之子豪华的庄园和奢侈的生活，还做了他儿子的教母。尽管这位旁遮普的“阿斗”在晚年进行了一次反抗，但反抗最终失败，他亦客死巴黎。

我坐的豪华空调舱票价一千五百卢比，当时相当于二百二十块人民币，还包含品种丰富的晚餐。我正在考虑要吃什么，总算打完电话的辛格先生突然向我伸出援手。

“他们有玛莎拉鸡和柠檬烤鸡，味道都不错，”辛格先生说，“你要哪种？”

“玛莎拉鸡。”

“他们还有蔬菜沙拉，要不要来点？”

“来点吧。”

“再来杯奶茶？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

辛格先生用印地语帮我翻译给服务员，我向他表示感谢。他耸了耸肩膀，挂着一副何足挂齿的表情。他喷着淡淡的香水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。他说他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，每月都要去香港和上海出差。他的父母在新德里，妻儿在旁遮普的卢迪亚纳。他刚从上海飞回新德里，乘“百年纪念号”回家。

“锡克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宗教，”当我和他谈起宗教时，他说，“我们尊崇十位古鲁，以他们传授的《阿底格兰特》为经典，《阿底格兰特》象征第十一位古鲁。”

锡克教以公平正义和宗教自由为基本教义。创教之初，第一代古鲁那纳克就提出中庸之道。他认为并无印度教，也无伊斯兰教，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一起。

“我们的寺庙和佛教的寺庙一样非常干净。我们欢迎任何人，不管他们是锡克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信徒，甚至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。”辛格说，“锡克教只要求信徒内心虔诚地信仰——这就足够了，甚至不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崇拜仪式。”

“锡克教徒为什么要把头发包起来？”

“我们认为头发是神圣之物。这有点像你们中国人说的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”辛格微微叹了口气，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管这套了，这是印度从来没有过的状况。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服务员端来香蕉和橙子，告诉我们火车正在经过印度最年轻的城市——昌迪加尔。夜幕下，不远处的城市用灯火勾勒出自己的线条与身影。和铁路并行的公路上，几辆铃木牌汽车被我们远远甩在身后。

“让昌迪加尔成为印度天赋的第一次伟大表达，像花一样绽放在印度新取得的独立上。”这是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传达给法国建筑师勒·柯布西耶的意图，后者受邀在这里建造一座崭新的城市。

从没有哪位建筑师拥有这样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美学抱负。柯布西耶1951年2月第一次涉足印度，仅四天之后，他就拿出一套蓝图：使整座城市呈现格子般的布局。在柯布西耶看来，城市的构成应如同人体。城市北部的建筑群代表“头部”，市中心是“心脏”，大学是“肋骨”，绿地和公园是“肺部”，而窗框般笔直、四通八达的公路是“血管”。城市被分成若干区域，建立以家庭为主导的社区，以控制不同社区间的交通流量。任何居民去处理日常事务都无须步行超过十分钟。任何一个房间或任何一扇打开的门都无须面对嘈杂的街道，这是柯布西耶规划的主旨。

柯布西耶主义与印度人习惯的美学思想大相径庭，但尼赫鲁给予他极大的认可——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

我热切欢迎昌迪加尔，

这一在印度的实验。

很多人议论纷纷，

有人喜欢，有人厌恶……

昌迪加尔给人当头一棒，

它可能令你不安，

但它也令你思考，

并接受新思想。

在很多领域，

印度最需要的，

就是当头一棒。

这样人们才能去思考。

这时，我身边突然出现一阵骚动。人们像母鸡看到撒在地上的玉米粒一样纷纷跑过来，与我前面的一位老人握手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辛格。

“啊哈，他是吴拉姆·阿里，巴基斯坦最著名的歌唱家，在印度也家喻户晓。”

辛格告诉我，小时候他父亲开车带他去看阿里的演出，很多人挤在一间小礼堂里，他自己长大后也收藏了一箱阿里的唱片，“阿里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”。

阿里戴着金边眼镜，穿着样式很像中山装的灰色衬衫。他听说我来自中国，便说十五年前他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过，脸上是一副天涯咫尺的神情。

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，阿里散发着德艺双馨的气场。一位乘客带头唱起他的老歌。阿里也随着众人打起节拍，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。他在贾朗达尔下车，人们抢着帮他提行李，纷纷与他告别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阿里消失在旁遮普的夜色中。

火车到达阿姆利则已是午夜时分。还留在车厢里的乘客，大都是去阿姆利则金庙的朝圣者。阿姆利则之于锡克教，就如同瓦拉纳西之于印度教、梵蒂冈之于天主教一样，皆为最神圣的宗教场所。和所有的圣地一样，这里人潮汹涌，充满神圣的世俗混乱。而作为边境城市，阿姆利则显然并非政府投资的首选。中央火车站的红砖上刻着“建于1931年”的字样，它显得比这个时间还要饱经风霜。大厅阴郁窒闷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，摩的司机和三轮车夫一起争抢着刚被火车站吐出来的乘客。

我试图感受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巴基斯坦。印巴分治以后，旁遮普一分为二，边境上曾有几百万人的大迁徙。人们拖家带口，赶着牛车，腾起的尘烟绵延数十公里。

一切早已了无痕迹。曾经的呼喊和伤痛，都化作史书上的一缕青烟。锡克人很快从分割的创伤中恢复过来。用辛格在火车上的话说：“锡克人大都非常努力，他们很快成为印度最富有的群体。”他们在每个领域都干得不错，位居要津的人不在少数，举其著者如曾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·辛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前往金庙，因为朝圣者太多，不得不提早下车，步行完最后一公里。一个锡克教徒把一块橙色头巾硬塞到我手里，管我要二十卢比，三块多人民币。“每个进金庙的人都要戴头巾。”他说。

我光着脚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涌进金庙。这座用镌刻经文的金叶打造的寺庙，被一片圣池环绕，金色的尖顶倒映在池水里，显得奢华无比。据说《罗摩衍那》里提到了这个地方，佛陀早在他的时代就感受

到此地的殊胜气氛。

由于金庙提供免费住宿、淋浴、饮食、奶茶，甚至甜点，很多锡克人干脆住在这里。1982年，一个叫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领袖进入金庙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宫殿。他首度现身时，国大党曾给予支持，幻想利用他来对付其他政治对手，结果养虎为患。宾德兰瓦勒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他宣扬要清洁锡克教的信仰，排斥印度教的救赎，即与神合一及超脱轮回的看法。他提出旁遮普应独立于印度统治，成立政教合一的国家。之后，恐怖主义成为他表达信仰的方式。他从巴基斯坦私运军火，暗杀印度教徒，抢劫银行，却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。

1984年6月，经历了毫无结果的谈判后，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·甘地下令军队进驻金庙，剿灭宾德兰瓦勒及其追随者。军队遭到强硬抵抗，因为不敢攻入金庙，他们的还击只能造成平民的伤亡和金庙的损坏。最后，军队请求装甲车支援。担心事态扩大的英迪拉·甘地犹豫不决，但最终批准请求。十三辆装甲车在金庙前一字排开，宾德兰瓦勒的追随者用反坦克火箭和燃烧瓶回击。

几天后，宾德兰瓦勒和他的追随者弹尽粮绝。他对追随者说：“愿意做殉道者的跟我走！”他带着五十名死士，手持冲锋枪从掩体中冲出，立刻被军队猛烈的扫射打成筛子。加上双方之前已经被打死的六百多人，金庙尸横遍野。

圣地惨遭亵渎的消息引起锡克教群体的强烈不满。更有谣言说，占领金庙的印度教士兵在里面喝酒、抽烟。英迪拉·甘地遭到抨击，军方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本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孤立宾德兰瓦勒。

锡克教群体的复仇行动不断发生，新德里到处部署着荷枪实弹的警察，但锡克人还是找到了机会。10月的一个清晨，毫无防备的英迪拉·甘地被她的两个锡克教保镖刺杀身亡。如今，那面溅满血迹的墙壁和它背后的故事，依然保存在新德里的英迪拉·甘地纪念馆。

在烈日下，人们像压缩饼干一样排着长队，等待进入金庙内部。他们最多在里面待上三分钟就要给后面的人让路。食堂里，三十多个厨师正在用铁锹做饭，四十多个刀工在削十几麻袋土豆，五十多个洗碗工在洗着数不胜数的餐具。在不锈钢的碰撞声里，锡克教朝圣者们坐在、躺在、跪在地上，等待开饭……

我决定离开。我打了一辆摩的来到火车站，立刻像一滴水，被人潮淹没。

## 8104号快车：瓦拉纳西—格雅

在印度旅行多日以后，我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到达一个地方，而是怎样到达。

我很少选择飞机，因为它把旅行简化为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乏味转换。身在印度，但又和印度毫无关系。我也很少选择长途大巴。印度的路况之差、超载之严重，往往让我还没上车就已心生绝望。

刚开始，我租过几次车。那是在印度最贫穷的北方邦，与尼泊尔接壤的地方。我还记得我坐在那辆“塔塔”牌轿车上，手心始终处于冒汗状态。车内的劣质音箱轰鸣着印度歌曲，司机不时揉揉发红的双眼，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就打开车门，把一口痰吐在地上。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——实际上，和很多印度司机一样，他把侧后视镜折了起来。而且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，他就要鸣笛。一路上都是花花绿绿的重型卡车，后面粉刷着“鸣笛”或者“请按喇叭”的卡通字体。一看到这些卡车，司机们就格外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按起喇叭，仿佛这是在印度开车的最大乐趣。甚至在无人的旷野，他们也习惯性鸣笛，让汽车发出一声声宣告势力的哀号。

坐了几次汽车之后，我变得几乎神经衰弱，这使我最终决定买一本列车时刻表，开始火车之旅。

第一次到瓦拉纳西车站，我就感到非同寻常。

那是凌晨5点，天空刚刚破晓，车站却早已一片喧闹。缠着红头巾的苦力，用脑袋顶着行李快走；卖奶茶和咖喱角的小贩吆喝不停；乘客们打着哈欠下车，花一卢比买一根长十厘米的树枝当牙刷，把绿色的唾液吐在站台上。站台下是五颜六色的垃圾和人体排泄物，老鼠们在其间快乐地寻找食物。

在中国，我已见不到这样的场景。每当火车快进站时，乘务员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厕所门一锁，任谁也别想使用。但在印度——这个人口有十三亿的民主国家，谁也不能剥夺人民排泄的自由。火车上，一位英俊的婆罗门就对我说，站台下的景象不仅不应被视为对尊严的侵犯，还应被看作对自由的表达。

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停满“觅食”的摩的，在昏黄的路灯下和城市一起被简略成一片低矮的剪影。空气中飘着牛粪和硫黄的味道。我不由得想起世界印度教大会上激进分子苏尼尔·曼辛卡的一句话：“神存在于牛粪中。”

牛是湿婆的坐骑，而瓦拉纳西正是“湿婆之城”——印度教最神圣的地方。这座建于五千年前的城市有两千多座印度教寺庙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涌到这里。他们生时希望在恒河沐浴，死后梦想把骨灰撒进恒河。7世纪，玄奘大师来到这里，看到人数远超过佛教徒的湿婆派修行者从事苦行，求证生死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，他形容这里“閻閼栴比，居人殷盛，家积巨万，室盈奇货”。

如今，瓦拉纳西依旧繁华，以致交通堵塞成为无解的难题。当三轮车、汽车、摩托车、马车、牛车、圣牛、人和流浪狗一起挤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，你只能把目光移向天空，告诉自己如果“瓦拉纳西的每颗石子都是湿婆的化身”，那么你眼前的一切一定也都无比神圣。

黎明时分，我坐着一叶小舟，在恒河上漂流。一位印度教苦行僧曾希望把恒河之水从天上引下凡间，以净化人们的灵魂。恒河女神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可水势太大，会淹没一切。苦行僧继续苦行，终于感动了湿婆。湿婆让浩瀚的恒河水流经自己的头顶，在他的发髻中，河水变成涓涓细流，它全长超过二千五百公里，成为印度文明的发源地。

此时，有人点亮荷灯。一盏盏荷灯顺流而下，像载着一个个往生的魂灵。一轮红日在对岸的白沙滩上喷薄欲出。我看到瓦拉纳西老城沉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，仿佛是由火车站里那些黑瘦的双手所建，带着一种即兴的、未完工的壮美。

码头石阶上，朝圣者一边双手合十祷告，一边洗澡，不少人眼中含泪。不远处是火葬台，焚烧尸体的黑烟伴着乌鸦的鸣叫随风飘逝。

太阳升了起来，恒河一片金色。在如梦如幻的薄雾里，我突然看到一群人影——没错，我揉了揉眼睛



——他们撩起印度长袍，像罗丹的“思想者”，正迎着朝阳，蹲在河边拉屎。

我再次感到瓦拉纳西的不同寻常。圣雄甘地说：“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，并不是一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，而是一坨坨粪便……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污染了神圣的河川，把圣洁的河岸变成苍蝇的滋生地……”一切都未曾改变，我甚至感到印度的力量正来自印度人这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。

在藏传佛教里，有这样一则故事。一天，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在恒河沐浴的人群中，洗一个装满脏东西的瓶子。当时还是婆罗门的马鸣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只洗瓶子表面，而不管里面的污垢？”提婆反问道：“人们通过沐浴能洁净身体，可是能洁净内心吗？”

这是我去鹿野苑的路上读到的故事。它表现了一种典型的佛教思维——对婆罗门正统观念的消解和反叛。但佛教同样强调忍辱和非暴力，所以它最终抵挡不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鲸吞——距瓦拉纳西十公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，如今已变成一座遗址公园。

在残垣断壁间的大树下，我看到很多情侣，让人意识不到正是在这里，佛陀首次开示他在菩提树下发现的一切：我们并不知道痛苦到底是什么。任何我们认为会让自己快乐的事物，若不是在痛苦边缘摇晃，就是瞬间变成痛苦的因。要认知世间明显的痛苦，相对比较容易，但是要感知在轮回中某些人所拥有的所谓“美好时光”其实就是痛苦，或将导致痛苦，却相当困难。痛苦并非从外在的源头降临到我们身上，而是我们自己情绪反应的产物。不论我们受了多少痛苦，不论我们感觉痛苦及其原因有多么真实，它其实是一种幻象，并非真实存在。佛陀告诉他的信徒，这个真谛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领悟的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指出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。

为了缅怀佛陀，我花了十卢比，相当于一块五人民币，进入鹿野苑。这里只有几个铁笼，里面养了些飞禽，最珍贵的是两只鹈鹕。旁边的小树林里，还有三只鹿，一只过来讨食，两只趴在树下。正当我掏出相机，准备记录佛历2555年的鹿野苑时，一个穿着印度长袍的精瘦男人从一棵树下走出来，眼睛里闪着鬼祟的光。

“朋友，需要帮助吗？”——印度人民习惯以“朋友”作为句子的开头，不管后面要讲什么，大有一股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气势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“我有一尊佛像，是从鹿野苑的达麦克塔上抠下来的。”他的声音与沿街叫卖果汁的小贩无异，“一千五百年历史，七千卢比，要多划算有多划算。”

我摇头。

他从长袍里摸出那尊石头佛像：“朋友，好吧，五千卢比就卖你。”

我加快脚步，不过很快又有一个小贩凑过来。他手里拿着一尊看上去就粗糙无比的佛像：“非常便宜，先生！一百卢比！”

我继续往前走，他也锲而不舍。一路上，他不断降低价格，由一百卢比降到二十卢比，最后破碎的声音终于由叫卖变成哀求。

“给我十卢比，先生，”他用手比画着，“吃饭。”

我拿出二十卢比放在地上，趁他捡钱的空当迅速离开。一道铁栏外，一双双黑瘦的手伸进来朝我喊着：“卢比！卢比！”

——我不叫卢比，也从未受到过如此欢迎。

佛陀入灭后两百多年，孔雀王朝出了一位笃信佛教的阿育王。他在鹿野苑树立起一座石柱，以纪念佛陀在这里初转法轮。7世纪，玄奘大师记载鹿野苑的寺庙里有小乘僧人一千五百名，精舍高达两百余尺，

四周墙壁上都有佛龛，里面供奉着黄金佛像。10世纪起，印度教徒开始占领鹿野苑。两个世纪后，鹿野苑被伊斯兰教徒夷为平地，佛教徒纷纷逃亡。19世纪，已经沦为当地人养猪场的鹿野苑引发英国考古学者的兴趣，亚历山大·坎宁安主持的发掘工作由此启动。但那些曾经用来建筑佛寺的砖石，却被当地政府运往瓦拉纳西修建各种建筑，其中就包括瓦拉纳西火车站。

我曾问过一个来印度朝圣的缅甸和尚，如果佛陀真的具有无边愿力，为什么圣地会有那么多乞丐，会如此贫穷？

“的确，佛教以慈悲为怀，但你要知道，佛教同样讲究因果报应。也许这听上去有点不妥……”缅甸和尚顿了一下，思考着如何措辞，然后接着说，“但在我看来，印度人造了太多的业。他们毁坏佛像，种下孽缘。我认为，这是他们今生受苦的根本原因。”

“那么，缅甸呢？”

“苦难到处都是。”

我看着眼前的鹿野苑，想着缅甸和尚的话，感到一种无言的悲伤，好像我一路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目睹眼前的断壁残垣和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。那些已经毁坏的、腐烂的、衰败的，显现的不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，就是征服者的暴虐和贪婪。

我想到佛陀的教诲：“一切建造必会崩塌；我们生命中聚合的人或物，终将离散；我们所见的世界，是自己感知的结果，它并不真实存在。”

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。仿佛为了表明他的真实不虚，他一到我面前就开口说话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后来，我得知这位拉亚帕拉先生是孟加拉人，定居伦敦。他正带着太太和儿子在印度旅游。

拉亚帕拉先生问我，对中国人来说上帝是谁？

我告诉他，在中国，有人信仰佛教，有人信仰基督，也有人信仰马克思，但大部分人没有信仰，也不把谁当作上帝。

拉亚帕拉先生并不太相信，他认为中国人一定有上帝，而且这个上帝是佛陀。我只好就此问题向他解释。

“佛陀并不是上帝，而是觉者。”我说，“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也就是觉悟的基因。所以佛经里说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。”

拉亚帕拉先生摇摇头，他说：“佛陀怎么可能不是上帝？即使在印度教里，佛陀也是第九大神。”他的太太和儿子站在旁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，好像在为这场争论做裁判。

拉亚帕拉先生站在树荫下，显出一副极力要说服我的样子，而我站在骄阳下，感到很有必要尽快结束对话。我对他说：“佛陀是中国人的上帝，你说得没错。”

我再次回到瓦拉纳西车站，因为人太多，只买到去格雅的站票。

8104号快车是典型的平民专列，它从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路颠到恰尔肯德的塔塔那迦——塔塔钢铁厂的所在地，需要三十四个小时。在我上车以前，它已经在路上吭哧吭哧地跑了一天一夜。在瓦拉纳西，它将停靠十五分钟，把已经饱和的载客能力再强行提高几个等级。

如今，我手里攥着的这张二等舱站票，已经因为紧张的心情而变得汗迹斑斑，像一根发软的面条。我想到甘地写过的情景：

“人们像对待羊一样对待三等舱的乘客，他们的舒适是羊的舒适。”甘地接着质问道，“一等舱的票价是二等舱的五倍，可二等舱的乘客是否享受到五分之一，甚至十分之一一等舱的舒适呢？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沿着季风的方向》刘子超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510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